

走在研究路上：

邢義田教授座談會（2018.04.19）



邢義田教授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座談會（2018年4月19日）

謝偉傑 游逸飛 陳弘音 訪談
郭 楓 張怡然 陳弘音 整理

引言

邢義田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邢教授為當今秦漢史領域的重要學者，著作等身，學術成就斐然。其研究成果不僅對海內外的早期及中古中國史研究領域產生廣泛影響，亦為世界史視野中古代帝國的比較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

由於邢教授於二〇一八年一月至五月期間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擔任訪問講座教授，藉此良機，中國文化學系邀請邢教授進行了一次座談會（2018年4月19日下午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是次活動由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謝偉傑博士主持，以訪談的形式，邀請邢義田教授與到場的學界及公眾人士分享其一路走來的求學、治學歷程及其間的經驗與感悟。本文根據講座現場的錄音及筆記整理而成，由於時間所限，未能論及的問題由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游逸飛博士、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陳弘音以線上訪談的形式增補提問，並加以統整，以求盡可能客觀、精要地將邢教授的學思面貌呈現於文字之中。

謝偉傑博士（以下稱「謝」）：邢教授，首先想請您談一談為何會走上中國歷史研究的道路。

邢義田教授（以下稱「邢」）：對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我小時候很喜歡聽故事。在那個年代，從小到大聽到的都是中國歷史的故事。後來，希望自己能從聽故事的人變成說故事的人，再加上在中學時遇到了很好的歷史老師于鴻霖先生，加深了我對歷史的興趣。到了考大學的時候，父母建議我選擇商科、法律或外文這些容易找工作的專業，但我考試的分數正好能進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稱了我的心願，爸媽也沒話可說。

謝：那麼，請問您為什麼選擇研究秦漢史？

邢：我在臺大歷史研究所讀碩士班時，最初選擇的領域是隋唐史。老師是傅樂成先生（傅斯年先生之侄）（圖一）。直到碩士班最後一年之前，我唸的一直都是隋唐史。碩士論文本來想寫唐代的邊防政策，卻發現唐人在討論對外政策時，大量徵引漢人的議論，使我驚覺自己對秦漢歷史知道的太少，不足以好好理解和評估唐人立論的理由。於是轉而大讀四史，論文也順勢改以〈漢代的以夷制夷政策〉為題。沒想到後來就沒能離開秦漢史這一研究領域。



圖一：邢義田作傅師鋼筆素描
（民國 63 年 5 月 2 日）

游逸飛博士（以下稱「游」）：如此說來，老師的秦漢史研究可說是發源於隋唐史。那麼為什麼後來沒有往下做呢？如果今天老師以秦漢史的根基往下續作隋唐，甚至是更晚的時代，老師會想做什麼樣的題目呢？

邢：這是假設性的問題，無法真正回答。我只能說因為以前曾稍稍讀過一些魏晉至隋唐的歷史，在處理秦漢問題時，思考的時空框架自然能擴大，不以秦漢為局限。例如我推測漢代案比在鄉或在縣，即曾參照唐代的貌閱人口而獲靈感；我寫秦漢的律令學時，其實是將漢代的經學博士、曹魏時出現的律博士和魏晉隋唐貴族社會的特性等放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中思考，才悟出律博士出現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和武帝時的五經博士不同。後來寫古代中國和域外的文化關係和發展，都將長時段的時空交涉放在論述的框架裡。如果不是對魏晉隋唐一段稍有認識，在較大的框架下思考，應寫不出那樣的論文的。

謝：您當初選擇到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攻讀博士學位，是出自怎樣的考慮？

邢：選擇夏威夷大學讀博士主要是兩個原因。碩士畢業後（1973），我到國立政治大學做了兩年講師。一九七四年夏天，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和中華民國教育部合作在臺灣提供一名博士生全額獎學金，並在臺灣舉行筆試和口試，我幸運考上了。雖然當時也申請了其他學校，但這份獎學金最優厚，讀書期間不必當助教或打工，我便決定「跟著錢走」（笑），這是其一。另一個理由也很重要。當時發現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同時有極好的羅馬史與秦漢史老師，圖書館收藏也很豐富，東西中心的政策又非常鼓勵學生研究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和比較。當時我深感到外國唸書就應該要多認識別人的傳統和文化。對於「別人的世界」我一直非常好奇，從小愛看《木馬屠城記》這類和荷馬史詩有關的電影，對特洛伊、古希臘、地中海世界的英雄和美人充滿既幼稚又羅曼蒂克的幻想。我忍不住去思考：作為同時期的東西兩大帝國——秦漢和羅馬帝國之間有怎樣的關係？選擇到夏威夷大學，就是因為我想要去切身認識中國以外的世界，也想要深入了解與秦漢同時期的羅馬帝國。我心想，出國以後無論何時回臺灣，都可以繼續研究秦漢史，出國期間就應該將時間擺在西方古代歷史上，同時也關注古代中國和周邊文化之間的關係。

謝：您在夏威夷大學讀博士期間下了很大功夫學習羅馬史，這對您研究中國歷史有怎樣的啟發？

邢：如果大家讀我寫的論文就可以發現，學習羅馬史使我在研究方法、和對比不同文化歷史傳統的認識上都有極大啟發，可以說受用不盡。我想說說學習羅馬史是一條艱難的路，很多人覺得我去夏威夷大學讀羅馬史簡直是腦筋燒壞了。如果只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幾年之內拿學位並不算難。但我比較反骨，大家都做的我不想做，想要自我挑戰。一九七五年我到夏威夷大學，正值美國獨立兩百年的前一年，當時歷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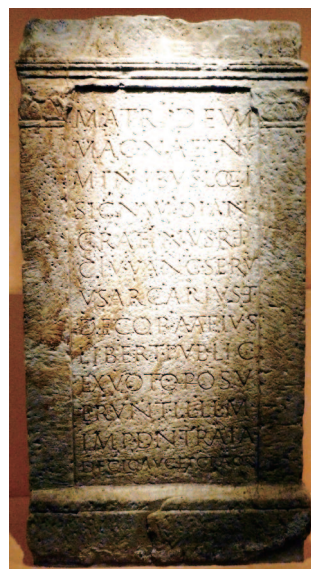
除了有研究秦漢史的陶天翼老師，還有專長羅馬軍事和宗教史的史培德（Michael P. Speidel）教授（圖二），學校另有古典系，提供希臘文、拉丁文和古典典籍研讀的課程。史培德教授是德國人，畢業自德國弗萊堡大學，受德國正宗的古典學訓練，通十種古典和當今歐洲語言，能以五種當代歐洲語言發表論文。他強調語文訓練，讀博士五年裡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語言上。他教我如何讀羅馬古碑，並利用碑銘作軍事史研究，由於羅馬帝國文獻材料有限，品質不齊且分散，他的軍事和宗教史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考古出土的碑銘上。



圖二：2016 年史培德教授攝於海德堡之南 Hohenkrähen 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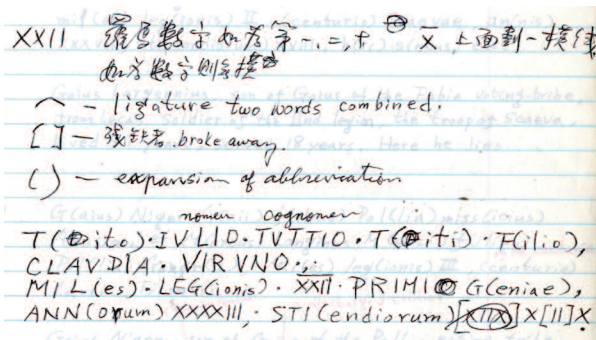
他的教導，使我在學習過程中養成了一字一字讀碑，把材料徹底弄清楚的習慣，這無形中影響了我後來研究居延漢簡的方法和態度。若說學習羅馬史對中國古史研究的影響，我想首先體現在這種治學態度和方法上。（圖三～五）

學羅馬史也讓我更清楚看到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在軍事上的不同特點。做博士論文時，我本來想寫羅馬的邊防政策，便利用東西中心的獎學金到歐洲，沿羅馬帝國北方今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威爾斯及萊茵、多瑙河等邊境考察並搜集資料。但發現相關材料實在太多，分佈廣泛，並且用各種歐洲語文寫成，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只好改題目，最後寫的是羅馬與漢朝軍隊在皇位繼承過程中扮演角色的比較研究（參閱 Hsing I-tien, “Rome and China: The Role of the Armies in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A Comparative Stud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0）。這在當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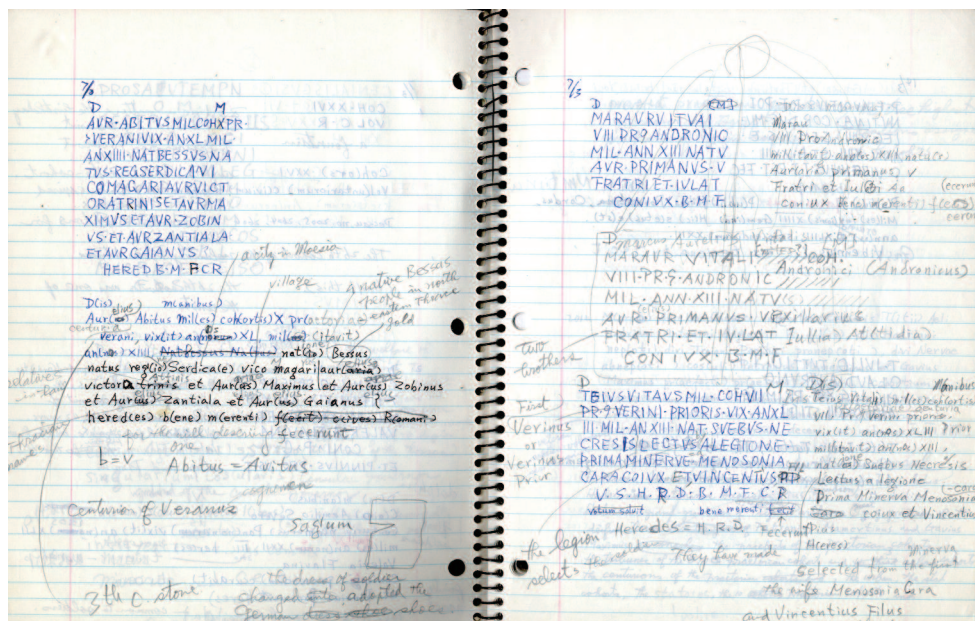


圖三：西元三世紀中期地母神獻祭碑（2016 年邢義田攝於德國 Speyer 博物館）

很有趣且熱門的題目，具備那個年代的現實意義。因為當時世界包括亞、非和中南美洲的不少國家，仍有很多所謂的「軍事強人」，軍政變時時發生，而羅馬帝國的權力轉移正是歷史上軍人干政的典型。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直白地說：「羅馬的命運捏在軍人的手中，軍隊的勝利帶來羅馬的擴張，也決定誰能登位稱帝。」（《編年史》Annals, I.31: “sua in manu sitam rem Romanam, suis victoriis augeri rem publicam, in suum cognomentum adscisci imperatores”）反觀漢朝，馬上就能覺察到兩漢的權力轉移情況很不同，直到東漢末才出現董卓、曹操等軍頭干政的情況。為什麼呢？我的論文就在探求其中的原因。



圖四：1976年邢義田學習羅馬碑銘課第一則筆記：
先學碑銘著錄體例符號



圖五：羅馬碑銘課筆記之兩頁

謝：您畢業回臺灣後，為什麼沒有教授羅馬史，而是選擇走向了中國古代帝國史的方向呢？

邢：一九八〇年回臺灣後，我其實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過一陣子羅馬史和西洋古代史，並翻譯過相關史料。沒有繼續的原因主要是當時環境不允許。那個年代臺灣沒有網路、資料庫，也極缺乏相關書籍和研究期刊，可以說除了中國和臺灣史，其他領域都欠缺研究條件。不過，我有了羅馬史的訓練，再回頭到中國古代史領域，可

以把那邊學到的方法與構想運用到秦漢史的研究上。由於曾讀羅馬碑銘，我從政大轉到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很快便注意到史語所不但收藏了居延漢簡，傅斯年圖書館更藏有數萬件歷朝歷代的碑石拓片，其中有些漢魏晉碑和漢畫像拓片，甚至原封不動，仍包裝在一九四九年運臺時的紙包裡。這彷彿是一片無邊的藍天。我便組織所中同好，開始整理、閱讀並記錄這些拓片，尤其是較有價值的漢畫拓片。這引導我走上在居延漢簡之外，另一條研究漢代畫像的道路。

陳弘音（以下稱「陳」）：老師在先前的訪談中提到，回臺灣之後曾經考慮教授羅馬史，卻由於當時臺灣的學術環境難以接觸西洋史的資料，無法支持老師繼續從事相關研究而作罷。此後老師以中國秦漢史為主要研究領域，但仍然持續翻譯羅馬史料出版，想請問老師，這樣對羅馬史「始終未能忘情」的表現，是因為什麼呢？羅馬史中是否存在特別吸引老師的部分？

邢：我曾開玩笑地對我班上的同學說，希臘、羅馬史是我的大老婆，秦漢史是我的小老婆，如果能讓大、小老婆水乳交融，豈不人生一大樂事？這是開玩笑的話，但也多少代表我真實的心情。前面不是說過嗎？我從小愛看木馬屠城這類英雄美人的電影，希臘史詩神話是我的初戀情人；難忘初戀，應該算正常吧？後來轉攻秦漢史，日久也就有了真情，說我移情別戀，不反對；但翻譯希臘和羅馬史料，持續關注地中海世界的考古和歷史，尤其關注羅馬皇帝的興衰起伏和羅馬法制的建立與變化，說明地中海古文明的內涵太豐富，有太多秦漢中國沒有的美好東西，真的太吸引我，在研究秦漢史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因比較對照而獲得靈感，情絲因此始終無法全然斬斷。

陳：羅馬與漢代都是龐大的帝國，因此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這也是以前老師給我們上「世界史一」的時候，再再強調的。那想請問老師，這種貼近於「比較」史學的觀點，老師認為對於自己研究秦漢與羅馬分別有何幫助？除了「護軍」、皇帝制度，還有哪些具體的例子？

邢：比較史學的幫助當然不止這些，例如我曾討論過希臘城邦在地中海世界，周代封建在古代中國各自具有體制上典範性的意義，也曾指出如何自西方學界討論希臘羅馬世界的識字率，引發我檢討應如何討論中國古代平民的讀寫能力和初級教育。或許大家比較沒注意，我甚至曾寫過希臘羅馬世界幾乎無城不有的公共澡堂和中國古代建築中浴廁空間和意義上的強烈反差。可說的例子太多太多，大家如果較認真地讀我寫的文章，即能發現。

謝：秦漢史的研究在過去一個世紀有了極大變化，尤其是材料方面，學界關注從傳世文獻轉向簡牘、畫像石／磚等出土材料方向，面對新材料，您覺得研究者看待秦漢以及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心態方面有怎樣的轉變？

邢：最早做學生時，雖然曾上過考古人類學導論這類課，除了文字性的資料並沒有真正認識到其他性質資料的重要性。到了夏威夷大學之後，我才認識到考古材料是如此重要。作為一名史學研究者，我想我們需要了解所有的資料，包括文字的與非文字的，如壁畫、畫像石／磚、器物等，只有將各種類型的資料都納入視野，才能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描繪出一個歷史時期較為完整的圖像。對於材料的選擇，我認為要一視同仁。因為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一個宏觀，一個微觀，兩者同樣重要，合則兩美，分則兩傷。研究的難點不在於解讀某個具體的材料，而在把握分寸，如何將某個具體的材料放在宏大的歷史圖景中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得出一個「恰如其分」的解釋。

我有時戲稱自己偏愛「三不管」地帶（笑），喜歡探究被大部分學者所忽略的三不管地帶，即各個研究領域之間的「縫隙」課題。通常研究傳世文獻的常專注於文獻，研究漢簡的專注簡帛材料，研究藝術的又僅注目於視覺性的材料，造成領域間的「縫隙」和被忽略的課題。我走到三不管的縫隙裡，利用不同的研究工具或採取不同的角度，發現歷史不應該被今天的研究分工領域硬生生地大切八塊，而應該讓不同的材料共同發聲，譜出一首首融而為一，和諧動聽的交響曲。例如，結合漢簡和畫像材料，就可以說出不少人所未知，多彩多姿的新故事。再例如以前學者研究簡牘僅僅注意簡上的文字，幾乎沒有人注意簡上的圖畫（圖六～七），其實這些簡上的圖和文字可以相輔相成，幫助我們具體認識古代的生活樣貌。居延簡上由邊塞駐軍信筆畫下的這些馬和人物，生動地反映了馬和養馬在邊塞生活和軍備上的重要，我甚至討論過木板畫樹上猴子具有的特殊意義（請參看〈「圖像與歷史研究」之孫悟空篇〉，《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4〕），這些頭戴進賢冠並佩劍或不佩劍的官吏也讓我們具體看到邊塞官吏的形象。

陳：所以老師認為，圖像研究與簡牘研究應當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但以現今學術研究的情況看來，治先秦史者，大多重視出土簡牘，而對於畫像類的材料，不論是研究的數量與質量都遠遠



圖六：居延漢簡 73EJC601AB 上的鞍馬、佩劍和不佩劍的官吏



圖七：居延肩水金關出土樹下養馬木板畫（甘肅省博物館藏）

遜於前者，可以說，在畫像研究的理論與視野上，還有許多拓展的空間。邢老師撰寫了許多奠基於畫像資料的研究，例如：《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可以說是畫像研究的領頭人，想請問老師，畫像研究是否對您有獨特的意義？

邢：這多少和我特殊的基因和喜好有關。家母是業餘水墨畫家，可能因為基因，我從小對圖形和色彩較敏感，也一直喜愛塗鴉。中學時參加美術社的課外活動，喜歡素描，也特別喜歡金工、木工之類的工藝。沒走上藝術這條路是因為考大學前，得到師大美術系某教授也是著名畫家的忠告：「當畫家，日子太苦。才氣不夠，千萬別入這行。」想想自己雖喜歡，才氣確實有限，就放棄了。幸好後來唸希臘羅馬史，接觸西方古典藝術，讓我深深陶醉在那種西方的古典美感中。到史語所工作，有機會整理漢代畫像拓片，很自然就愛上，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一直想追問一個傻問題：中國古代為什麼就沒有維納斯那樣的雕像？我相信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但在許多方面，不單是藝術，也包括數學、物理、天文、生物、法學和哲學等等並不如人，身為中華文化的一份子，必得認識並承認自己的弱點，謙卑面對才行。

游、陳：邢老師在秦漢史領域著作等身，研究內容包含皇帝制度、行政制度、法律，而使用的材料則橫跨典籍、簡牘與畫像，想請問老師，您認為自己研究的核心關注為何？想要透過研究傳達什麼樣的中國史圖像？傅斯年的史學（也就是史料學）、許倬雲的社會科學治史、杜正勝的生命醫療史（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三個脈絡，均是影響臺灣史學的重要脈絡，您是否受影響？評價如何？

邢：我當然受到史語所傳統，一般人所說「史料派」的影響，也受到社會科學的影響，但不是沒有反省。具體思辨可以參考我十四年前為史語所七十五周年所寫〈變與不變——一個史語所歷史學徒的省思〉（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和最新一本書《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18）裡的自白，這裡就不多說了。《畫外之意》寫完，對怎麼看待歷史，又進一步地反省，等想法較成熟後，再寫出來吧。

我是一個自得其樂的人，研究生涯四十年如一日，並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也不在意是否曾帶領風潮，是否建立學派而影響一代的史學發展。我常跟班上學生說，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別老跟著師長走。我相信研究如果真作得好，立論站得住，運用的方法有價值，自然有人追隨；如不夠好，雖轟動一時，引起熱議，終必淘汰。

游：老師大學與碩士班在臺大求學，博士班去夏威夷，回國後主要在史語所工作，直至退休。想請老師介紹一下，在您求學過程中對您影響最深的老師以及學友？或許還可這麼問，是否有影響您治學最深遠的經典？

邢：影響我的師友太多太多了。在臺灣求學階段，當然是許倬雲和陶晉生老師。他們引導我們這一代的學生學習社會科學，並以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等的方法，或當時所謂「科際整合」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許老師當時是系主任，每年自國外請回不少客座教授，帶入很多國外流行的新觀念和新方法，對學生影響極大。例如我早年曾試圖借用「涵化概念」（acculturation）分析府兵制，利用資料量化，討論東漢孝廉的身份和地域背景。但我後來覺得社會科學並不能取代歷史學，所謂社會科學的方法源自西方，也不見得適合應用在分析古代中國的歷史問題上，因此逐漸離開了這一路子。

另一方面，大學時我也受到傳統史學的影響。例如夏德儀老師帶我們讀明清史以及那時剛出版的《明實錄》，也帶我們讀《資治通鑑》。這是第一次學習到如何閱讀並比對傳統史料。記得在夏老師班上，我曾練習寫了一篇〈據《明實錄》校正《明史》等書所載「土木之變」之誤〉；因為讀《資治通鑑》，到研究所時，進一步受陳寅恪啓發，才有可能寫了〈契丹與五代政權更迭之關係〉。這些習作走傳統考證的路子，並沒有社會科學的影子。傅樂成老師則引導我實質進入秦漢和隋唐的歷史世界。四史和隋唐五代史等等都是在傅老師指導下閱讀。他細心批改我的碩士論文，他的批改使我真正覺悟到寫作的要訣。

此外，讀研究所時，剛巧系上請到自美國回臺客座的蔡石山老師，讀了一年「西洋史學名著選讀」，第一次通讀英文本的希羅多德《波希戰爭史》和布克哈特的《義大利北部文藝復興》，完全被西方史學名著迷住。課中當然還讀了些其他的書，老師只要求讀各書的一部分，以上兩本我不捨晝夜整個讀完，感覺和讀中國傳統史籍太不一樣，太有趣，寫了一篇《波希戰爭史》讀後報告，堅定了我進一步研讀西方史學作品的興趣。現在回想，如果不是蔡老師的課，如果不是主張會通東西方史學的杜維運老師始終鼓勵，我大概不會出國唸書，也不會進一步去碰觸西洋古代史。

到史語所工作後不久，正巧勞榦和嚴耕望先生先後回史語所並在臺大講課。我和幾位同事，記得其中有杜正勝，每周去臺大並聽課，有時陪他們回史語所。勞、嚴二位前輩上課作風完全不同，勞先生才氣縱橫，天馬行空，學生如對秦漢史不是稍有知識，不容易捉捕到他議論中的精華。嚴先生口音較重，幸好課上都備有他手抄油印的講義，講義上列出一段段史料，讀完剛好解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上嚴先生的課，可以明白他如何寫出《唐代交通圖考》，也學習到他的方法。嚴先生影響我很大的除了治學，更重要的是一種學者恬淡自適，不忮不求的生活態度。還有太多其他的良師益友，無法一一羅列了。

編者按：

就此話題，邢教授以「山東青島土山屯 147 號漢墓出土遣冊名刺及玉印」（哀帝元壽二年，西元前 1 年）為例進行講解。此漢墓位於青島土山屯墓群，據出土的遣冊及印章，墓主人是當時的一位地方官員——堂邑縣令劉賜。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相當完整罩在墓主臉上的玉質面罩，上面有花紋圖案，而出土的陪葬品清單（遣冊）上載明有玉溫明一具。這完全證實了傳世文獻中所說的「溫明」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另外有趣的東西是出土了兩枚墨書玉印以及遣冊上明確將戶口簿列為陪葬品。照漢世的規定，真正的官印和戶口簿等公文必須移交，不能拿來陪葬，墨書的印章和重抄的戶口簿可以證明他們都是所謂的明器而不是真正的官印和公文原件。邢教授總結道，目前出土文字性和非文字性的資料，使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秦漢時代較屬基層社會的情況，容許我們有機會「由下往上」做研究。

現場聽眾問答環節

Q1：您提到研讀羅馬古碑的經歷，請問您在讀碑時如果遇到不認識的字會如何處理？

邢：如果實在釋讀不出，只能略過。有些字殘缺太過，連羅馬碑銘專家也讀不出，只好畫上闕文符號。我回臺灣教書，曾翻譯過少數羅馬碑銘，只挑可以確認、較完整、較沒爭議的釋讀。許多碑銘因殘碎漫漶，不易釋讀，往往須要耐心等待，有時有新的出土，出現相關的字句或內容，通過累積、比對，有些疑惑就能得到解答。中文碑銘和簡牘的釋讀，其實也往往是如此。

Q2：剛才您講演時展現的墓葬材料中有官印和戶口簿，是否能反映出墓主期待在死後世界中仍能做官？

邢：這個問題很有價值，涉及到古代的生死觀。古人相信有死後世界，生死是一個連續體，死後仍有生命和生活，所以仍可做官、升官。把生前做官的物品陪葬，通過「告地書」這類文件將訊息告知地下官吏，也把自己在陽間的戶口轉移到地下。

Q3：您覺得年輕學者要如何平衡自己的研究興趣與現時學術界的需要？如果想利用邊緣材料或跨學科材料做研究，怎樣能夠更順利地去打動評審，拿到研究經費或參與學術會議？

邢：打破學科邊界的確不易，但需要有人去打破。不過，所謂的「打破」其實包括許多方式，比如去挑戰既有研究領域的課題和界限，去彌合中外學術界的界限，以及去跨越文字材料與非文字材料的界限。在學術研究成長的過程裡，顧及研究計劃能

通過，能參加會議，能拿到研究經費和順利提升職稱，須要面對審查人既有的認識和威權，談「打破」當然要冒風險，可以大好，也可能大壞。這牽涉到的不僅是個人取向，更牽涉到整個學術環境是否足夠寬容創新和突破。不同的地方會很不相同。我對香港的情況不夠了解，香港的學者應能作較好的評估。

Q4：您對於從事羅馬史和秦漢史比較研究學者有什麼建議？

邢：今天在中國，年輕學者去從事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甚至做外國歷史的題目已經沒有什麼大問題了。網路的發達帶來了大量的資料和信息，利用日益增多的資料庫和電子期刊等材料，以及即時的考古信息（有些地中海考古發掘現場會在網上直播）做研究，遠比我四十年前要容易太多太多。現在我已追趕不上，無力作希臘和羅馬史研究了，但仍然透過網站訂閱書評和考古動態報導，借助這些渠道可以知道很多新發現和研究的成果。今天的中國學者要作中國以外的歷史研究，我會誠心建議，最好先充實對本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到了國外，發現自己對自己的歷史文化知識不足，豈不遺憾？又如何能作出較有意義，不流於表面或錯誤的比較研究？

Q5：也許這並不算一個問題，不過直到今天，我們都看到中國人去西方學習研究中國史，我在想什麼時候會有人來中國大陸或是香港、臺灣學習包括羅馬史在內的西方歷史？

邢：我比較知道的限於中國古代史研究這方面。其實國外漢學，尤其是中國古代史這部分這些年在走下坡，現在最好、最新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成果幾乎都以中文發表。中國古代史和文化研究的中心已不在巴黎，而在中國。這正是傅斯年先生當年希望作到的。外國人到香港、臺灣或中國大陸學羅馬史或西方歷史？一時還看不出可能。兩岸三地這些年來雖然已有較多人投入中國以外文明和歷史的研究，但要吸引外國人來兩岸三地學習這些，條件還遠遠不夠，路還很長遠。

Q6：您早年曾到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考察，請問其中有沒有什麼有意義或有趣的經歷分享？

邢：我第一次去中國大陸是在一九九〇年，從北到南，從西到東，去了很多地方，當時是由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徐蘋芳先生幫忙安排了一條非常好的考古參訪路線。不過大陸每個省市的具體情況很不一樣，有些地方較開放，有些較保守，不輕易對外人開放。據個人這幾十年的經驗，如果以個人名義或方式去參觀，事先聯絡好，一般可以成功看到材料。「個人關係」很重要。舉例來說，我的小書《畫外之意》正文只有一百多頁，但記述考察各地畫像石經過的〈畫像石過眼錄〉卻寫了兩百多頁。我之所以寫下這些，就是因為在過程中曾獲得太多太多的人熱心無私的協助，心存感謝，不能不留下他們的身影。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我的畫像石研究幾乎不可能進行。

Q7：請問您一路走來做研究的長久動力是什麼？

邢：我也許是天生反骨吧！（笑）不太願意接受現成的答案。好奇和懷疑逼迫自己雞蛋裡挑骨頭，常發現前賢在有意無意間留下論證或課題上的「縫隙」，這些縫隙往往就是我的天空，通過「越界」，常常能夠撿到不少別人遺漏或捨棄的東西。「撿到」或「發現」的快樂應該是我作研究最主要的動力。人一輩子應該作自己感到快樂的事。應該說，這是我人生至今最大的幸福。

文稿整理：郭楓、張怡然、陳弘音
2018/8/15 游逸飛、陳弘音增補提問